

中国经济向何处去

何家成经济论文选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中国经济 向何处去

何家成 经济论文选



F120.2-53/1

19200215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中国经济向何处去

——何家成经济论文选

何家成 著

责任编辑：曲子玮

封面设计：王丽杰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 42 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二厂印刷·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 印张 12.25 · 插页 2 · 字数 286 千

1991 年 7 月第 1 版 · 199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 000

ISBN 7—5316—0759—X/F · 26 定价：5.30 元

序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全党工作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根本方针。但十年“动乱”对中国经济建设所带来的破坏性后果尚未消除，经济增长效益低下，经济结构严重失衡，传统经济体制已制约了生产力的发展。如何实现经济的有效增长？如何推动经济结构的进步？如何建立符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新经济体制？简言之，中国经济向何处去？不仅举世瞩目，而且成为中国经济学家所必须回答的重大理论课题。

何家成同志作为积极参与过去十年经济改革的青年经济学家，对此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概括起来，有四个方面：一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研究。他认为，改革作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她的成功首先取决于能否正确认识国情，科学阐明我国现在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并在此基础上回答改革的起点模式、目标模式和过渡模式这样三个基本问题。二是价格改革，他认为，解决“计划与市场”、“集中与分散”的关系问题，核心是理顺价格体系，确立市场导向的国家可调控的价格体制。中国要完成这一任务，必须走“调放”结合的改革道路。三是企业改革，他认为，建立符合现代化商品经济社会化大生产发展要求的产权制度、组织和规范，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一项特殊任务，实现这个目标，要分阶段地推进改革。推行承包制仅仅是改革的起步阶段；深化企业改革要求逐步推行符合国情的股份制，解决产权虚置和分割问题。界定公有制企业生产者的身份和角度，则是企业改革升华阶段的主攻方向。

四是经济发展。他认为，处理好经济发展与改革的关系，既是决定改革能否成功的条件，又是衡量改革是否成功的标准。在现阶段，需要通过发展乡镇企业，进一步实行工业化，推进结构进步，走向世界市场，实现从传统经济结构到现代经济结构的转变。

中国经济向何处去？这绝不是一句诱人的口号，这是来自于对中外现代经济理论的研究；来自于中国十年经济改革实践的经验；来自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成败的深刻教训，一句话，来自于科学和实践。何家成的勤奋和思考倾注了他全部的心血，但愿他的研究成果能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

戴园晨

目 录

序	戴园晨
伟大的实践需要伟大的理论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探索	(1)
论中国经济改革的任务和道路	(21)
经济体制改革与宏观经济管理	(42)
论全民所有制企业的经济本质	(75)
经济运行模式的转换	(95)
微观经济基础的重新构造	(113)
公有制企业改革再认识：起步、深化、升华	(129)
坚持两权分离，转变企业经营机制	(155)
企业改革的方向是转变内部经营机制	(173)
论总需求膨胀的枢纽转换	(177)
以结构进步为轴心，设计经济体制改革	(194)
我国工业结构的演化	(206)
经济结构转换的比较与选择	(219)
对几年来经济建设与经济改革的反思	(245)
论经济改革与经济增长	(261)
在改革中求稳定 在稳定中求发展	
——八年改革实践的反思	(272)

论具有中国特色的价格改革道路——	(278)
对我国近期物价水平趋势的估计	(292)
论我国职工的工资补偿	(301)
论市场体系的形成	(320)
建立完整、开放和竞争的市场体系	(337)
关键要按照价值规律办事	(345)
我国居民生活的历史性转折	
——来自一万户城乡居民的调查	(348)
中国农村进一步工业化的政策选择	(359)

伟大的实践需要伟大的理论^①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探索

一、科学地阐明我国社会现在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成就。经济改革不仅极大地发展了生产力，而且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激起了包括政治、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体制在内的深刻的社会变革，从而全面巩固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这八年是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最快、经济基础最巩固、社会主义民主发扬最充分、人民群众物质文化需要得到最好满足的时期。

但是，体制改革从一开始就遇到了种种阻力和难以想象的困难。这里，真正的障碍不在价格改革这个曾经被我们认为是改革成败的关键方面，或者搞活国营企业这个至今仍然是改革的中心环节方面，也不在改革本身的战略选择这种似乎极为重要的方面，或改革中的利益摩擦冲突这些很可能造成经济社会

① 本文的主要部分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探索》为题，发表于《人民日报》1987年6月19日。

剧烈动荡的方面，而是来自于认识的模糊与混乱，观念的保守与偏激，特别是改革基础理论的不明确。甚至从改革中得到实惠的人们，在他们判别事物和思维的公理系统中，对改革前工资长期冻结，八亿农民温饱问题尚未解决，并不怀疑是社会主义，但对人民收入大幅度的提高的档次适当的拉开却怀疑不是社会主义；对生活必需品的短缺和配给并不怀疑是社会主义，但对市场的普遍充裕和价格的正常波动却怀疑不是社会主义；对个人在就业时象物资调拨一样不怀疑是社会主义，但对合同工、工人的流动和解聘却怀疑不是社会主义；对人们不敢讲心理话、实在话不怀疑是社会主义，但对人们敞开思想、畅所欲言却怀疑不是社会主义。正是由于思想认识上的含混和颠倒，我们以往的改革没有取得更大的成就，今天的改革很难深化并可能进入进退两难的相持境地。

其实，这也并不奇怪。无产阶级事业的成功，从来都有伟大的理论作为行动指南。苏联十月革命的胜利是这样，中国第一次革命的胜利也是这样。与此相反，在苏联和东欧国家，以往几十年的体制改革由于缺乏指导改革的基础理论，都毫无例外地步入了一种旷日持久、成功希望渺茫的困境。目前正在苏联和东欧国家兴起的新一轮改革浪潮，如果仍然缺乏理论指导，那么注定也不会取得真正意义上的成功。

从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高度来开拓视野，就会发现，在世界人民希望所寄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并没有得到应有发挥的同时，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没有得到更大的发展。这里的一个基本原因是，在所有获得成功的国家或革命尚未成功的国家，都缺乏切合实际的、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

这样看来，我们的改革作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她的成败，最需要的是一种伟大理论的全面指导，其中科学

地阐明我国社会现在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既是我们今天只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搞活的路线方针的基本根据，也是从国情出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因此，创立和发展全面指导改革的理论，将能统一全党的认识、凝聚全国人民，坚定改革的信心，使我们真正摆脱左右摇摆、正确和谬误模糊的局面，并成功地完成被邓小平同志精辟地概括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的改革。在今天这应该是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常识。

二、实事求是，一切从基本经济关系的实际出发，是确定我国社会现在所处发展阶段的唯一科学方法

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学说，由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共同构成：一个是社会主义应当是什么，另一个是社会主义在现阶段实践中只能是什么。它的完整和成熟在当代的关键是要对后一个方面作出科学的探索。面在这个方面的每一步前进，需要的就不仅仅是以丰富的实践经验为条件，要重要的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基本经济关系的实际出发。

马克思、恩格斯按照他们始终坚持的科学方法，对共产主义社会作了划分，他们认为：第一阶段是社会主义，高级阶段是共产主义。^①他们给出的分阶段逐步过渡的原则和构想，至今对我们仍有不可低估的指导意义，但由于受历史条件的限制，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对社会主义只能是什么作出具体的设想。

^①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也明确指出：马克思称之为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通常叫社会主义”。《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0页。

十月革命开创了社会主义实践后，客观上提供了具体探讨社会主义应当是什么的可能，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提供了深入探讨社会主义在现阶段只能是什么的可能。列宁正是从这两个方面进行探索的创始人，但毕竟由于社会主义的实践刚刚开始几年，客观条件本身不允许列宁完成创立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学说的任务。

从那以后，社会主义不断丰富的实践，特别是改革的实践，给人们建立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学说，提供了更多和可靠的客观条件，然而，直到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包括我国在内的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在理论探索方面踯躅不前，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社会主义实践也因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苏联有深刻的教训，我国也有沉痛的教训。

人们在认识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方面的偏差和失误，归结起来，几乎全部的原因都是在方法论上，没有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这个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和精髓，没有以实践中的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做为全部理论的基本出发点，没有对社会主义在现阶段只能是什么核心问题作出正面的回答。

在今天的探索中，值得我们特别加以克服的方法论缺陷是：(1)教条式地从抽象的定义出发，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设想，或者把经典作家的某些具体论述绝对化、固定化，并以此来框测社会主义的实践；(2)经验式地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出发，照搬别国的实践和理论，并以此来推断本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3)不恰当地从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前的实践出发，把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特点完全归结为由历史前提所决定，并以此来判断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4)单线条地从现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出发，或者笼统地把发展水平低归结为生产力不发达，或者把生产力简单地

等同于有失偏颇的人均产量和收入，并以此来判定社会主义发展阶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能够逐步认识到，我国社会现在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能够逐渐把握初级阶段的一些经济、政治、思想、道德和文化方面的特征，^①这完全是因为我们党拨乱反正，始终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正如邓小平同志在当时就指出的那样，“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②

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公有制和按劳分配 决定了基本经济关系的社会主义本质特征，但还具有内在的不完全性

对公有制和按劳公配本身的分析和把握，是确定我国社会现在所处发展阶段的一个核心问题，但迄今为止，这往往仍是一个迷失了的主体。人们常常忽略对公有制和按劳分配这个主体的研究，单线条地把重点放在非公有经济成份和非按劳分配的分析上，因而只能在真理的边缘绕圈子。判定事物的本质特征，首先要求准确地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马克思如果不把研究的重点放在资本方面，就不能科学揭示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关系。同样，毛泽东同志如果不把分析的重点放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形态方面，就不可能正确把握中国第一次革命的规律。

① 初级阶段这个概念，第一次提出是1981年6月的《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二次，1982年3月《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第三次，1986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思想的决议》。

② 《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33页。

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已经有了 70 年的历史。如果说在这之前，社会主义已经从空想变为科学，那么在今天，它已不在仅仅是设想和理论，而是活生生的铁的事实。世界历史在当代最伟大的成就正是：共产主义在实践中。然而每一个尊重事实的人都会看到，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设想来构造的经济体制，在各国社会主义实践中都遇到了不同程度的困难和挫折，其中特别是在根治“财产在一极积累、贫困在另一极积累”^①的通病和痼疾的同时，并没有出现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设想那样的运行效率和优化发展。这恰恰是传统体制偏离现阶段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真实内涵的集中表现，也是半个多世纪以来，社会主义经济面临重大挑战的经济根源。因此，问题归结为要重新认识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在实践中的本质和内涵。

我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在经济方面的第一个决定性的行动就是通过剥夺和赎买，把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转变为社会占有。这就从规定社会基本经济关系的本质方面，排除了凭借私人财产攫取经济权利和地位的可能，提供了凭借自己劳动享有经济权利和地位的可能，内在地导致了社会只能按劳动来进行分配。正是这样一种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决定了我国现阶段的基本经济关系已经具备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除了承认劳动本身的差别以外，并不承认任何其他形式的特权。^②

但问题在于，在社会主义现阶段的实践中，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并没有同时导致生产资料的社会化统一使用，即没有象马克思主义理论模式所设想的那样达到“生产资料的全国性集中”，^③而只能实行生产资料以企业为单位的分散化的个别使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708 页。

②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11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32 页。

用。这一事实在公有制的实现方式上带来了如下矛盾：如果生产资料的这种使用方式不同个别使用者的物质利益相联系，即不承认企业本身也是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就会降低生产资料的使用效益，并最终与生产力发展的内在逻辑相冲突，这正是传统体制一再显示的种种弊病的根源所在；相反，如果承认企业自身的经济利益，就意味着在生产资料的个别使用中，社会必须对非劳动的差别——首先是指不同企业之间由于资金的有机构成不同，以及外部环境如地理位置、市场条件等不同而引起的差别——予以承认。

不仅如此，当生产的社会化程度较低，商品经济和市场体系还不发达，国民经济各组成部分的经济差异或非同质性较大，因而计划机制和市场机制都还无法优化运转的条件下，公有制经济不仅在生产资料的个别使用中难以剔除如上所述的非劳动的差别，而且甚至在生产资料与个别劳动的结合方式上也无法为全社会的劳动者提供完全平等的权利和机会，即无法按照马克思所设想的那样保证每个劳动者自由地、机会平等地与生产资料相结合，由此，社会所承认的还只能是在权利和机会不完全平等条件下的劳动的差别。所有这些，都与马克思所定义的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内涵发生了或多或少的偏离，这正是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不完善的本质所在。也正因为这样，使我们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还不具备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阶段的性质，从而决定了我们今天还依然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问题还不止于此。我国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不完全性还有特殊的历史或传统文化方面的原因。史学研究、特别是中外历史的比较分析表明，中国封建社会各种社会关系的两个基本支点，一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封建宗法关系，二是君臣之间的皇权依附关系。这两种关系的过度发育，不仅在人们之间的经济

往来中打下了人身依附的烙印，而且也使得发展社会化大生产所需要的各种条件，首先是产权的明确界定和个人利益的独立化，难以在封建社会的母体中自发地孕育成熟。因此，尽管中国历史上不乏有规模可观的商品交换和社会分工，但与现代商品经济从而与社会化大生产本身相联系的一系列行为规则和社会规范却难以最终生成和发展。这是中国社会到了近代必然落后于西方国家的基本原因。

作为几千年封建历史的胎迹，腐朽落后的宗法关系、皇权依附关系以及由此生成的封建意识形态，远不象“剥夺剥夺者”^①那样，可以通过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而得到彻底的清除。因此，虽然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已经作为一种制度在我国建立起来，但这一制度因为受“死人抓住活人”^②的规律的影响而在其实现过程中不能不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形和扭曲。一方面，公有制特别是它在现阶段所采取的国有制形式，在运行过程中往往显示出“政企不分”或经济关系依附行政规则的特征；另一方面，按劳分配原则很容易受到宗法关系残余和平均主义思想的侵蚀，在应该承认差别的环节弱化差别，在应该追求平等的环节则又阻碍平等。所有这些不仅直接压抑了生产潜力的发挥，也在更深的层次上使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具有了自身的独特性和复杂性；它说明我国现阶段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实现程度比苏联、东欧国家更低、更不完善，因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也必然更漫长，任务更艰巨。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599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11页。

四、多种经济成份并存、商品经济、市场机制和计划机制都是适应并促进生产社会化的中性手段和方法

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实践中一再遇到的另一类两难矛盾是，一方面如果运用市场机制、发展商品经济和允许多种经济成份并存，似乎就是复活和发展资本主义；如果让计划机制包揽一切，似乎就是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在另一方面，如果不这样去发展“资本主义”、或坚持搞这种“社会主义”，又与生产力发展和生产社会化的进程产生尖锐的冲突，进而要求运用市场机制发展商品经济，允许多种经济成份并存，并缩小计划机制的作用范围。

因此要重新认识适应并促进生产社会化的手段和方法的经济关系属性。广义地说，生产者的社会关系，他们借以相互交换其活动和产品的社会条件，以及生产和交换的内部组织，都是人类社会为克服人与自然的矛盾，即发展社会生产力而创造出来的经济手段和经济方法。问题在于这些经济手段和方法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规定一个社会的基本经济特征，它们反映的是该社会经济中人与人的本质关系，例如，一个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所有制关系和与之相适应的分配形式，这类手段和方法只适用于某个特定的社会；另一类是不能规定一个社会的基本经济特征，它们反映的是该社会非本质的经济关系，例如，税收、价格、计划和市场机制等等，这类手段有的适用于同一社会形态的不同阶段，有的适用于不同的社会形态，任何一个社会总是同时利用这两类手段和方法，区别仅在于不同的配组。特别是，从促进生产力发展的角度看，无论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还是在今天我们所处时代，都还存在着那种既不姓“资”又不姓“社”的“中性”手段。

和方法。这正是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能够并需要运用资本主义企业内那种指挥乐队一样的管理方法，^①列宁认为社会主义能够并需要运用资本主义大托拉斯组织形式^②的根本原因。

在这个意义上，多种经济成份并存就是一种适应和促进生产社会化的中性手段和方法。

在马克思逝世后的一百多年里，现代生产力虽然已发展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但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也不可能消除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多层次性，相反却先后出现生产大型化和小型化、集中化和分散化并行不悖的新趋势。这必然要求社会允许多种所有制形式或经济成份并存，以便适应生产社会化的发展，并通过各种经济成份的“竞争”和“淘汰”，促使每一种经济成份更有活力和效率，从而推动生产力更为迅猛地向前发展。多种经济成份并存因此也就成了当前任何一个社会都可以利用的“中性”手段和方法了。

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英国不仅有主导的资本主义经济成份，而且有前资本主义经济成份，甚至还有公有制经济成份，马克思并没有因为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事实而把英国不作为资本主义的典型，并能从整体上科学地揭示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同样，即使在欧洲典型的封建社会，不仅有封建经济，也有奴隶制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成份的存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丝毫也没有因此改变确认欧洲社会是封建经济。之所以能够这样，马克思本人阐明的再清楚不过了：“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支配着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支配着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一切其他色彩都隐没其中，它使它们的特点变了样。这是一种特殊的以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435页。

② 列宁：《论“左派”幼稚病和小资产阶级性》，《列宁选集》第27卷，第325页。